

《自由中國》半月刊中 關於憲政論述的歷史分析

陳 瑞 崇 *

本研究根據政治思想史方法論的提示，針對發行於五〇年代的《自由中國》半月刊中的「憲政論述」，進行一項在歷史、方法論、理論及思想人物等層次上的分析。所謂「憲政論述」是指：針對與立憲主義相關的「觀念」議題、與政府統治有關的「制度／政策」議題、與政治活動相關的「行動」議題等三大議題所進行的論述總稱。本研究試圖檢視憲政論述之社會政治意涵及呈現語言／觀念意涵，即將憲政論述及其提出視為一項政治理念、意識型態、政治語言及政治行動的綜合體。另一方面，本研究嘗試就論述內容分析《自由中國》時期的反對精英的「政治秩序」觀念即論述典範，主要探討他們對「政治」的看法及相關憲法理念的理解與運用。

一、研究動機：台灣政治民主化與政治論述之關係

在「政治民主化」議題日漸受到高度關注與期待的九〇年代，國內各階層人士以各自嫻熟的途徑，表示對「民主」作為一種政治生活形式的看法及對當前政治情勢的評估。這類見解反映出當前我國流行的政治理念、政治議題、表述方式及行動方案，從中可瞭解國人為什麼／如何在具體的歷史背景中，針對特定議題進行有關「民主」理念、制度及行動等層面的表述，即可瞭解為什麼他們相信民主是好的、真的、值得的及可能的？應如何追求？為什麼他們認為民主就是應該這樣或不是那樣？這些見解是構成政治生活的必要部分，即展現出國人當前之公共價值位階的安排。

* 本文作者係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專任講師。

這些關於「民主」的表述出現於意見市場後，會逸出「表示」的作用，而轉化成發表見解的個人或團體或其他公眾，都難以控制與預期的政治力量。政治論述先天具有但潛在的行動取向，使得政治論述與政治行動產生相伴而生、共存共變的關係。有關政治行動或結構變遷的研究必須基於到前述關係，否則任何解釋都可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本研究即是在關心台灣政治民主化之歷程的背景下，基於對政治論述之「表示」與「行動」雙重特性的興趣而展開。

從台灣戰後歷史來看，首次對「政治民主化」議題進行熱切且持續的討論，是在一九四九年國府播遷來台後的第一個十年，由胡適為發行人（後因『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文章風波於一九五三年辭去發行人）毛子水、杭立武、殷海光、夏道平、張佛泉、雷震等人為編輯委員的《自由中國》半月刊（以下簡稱《自由中國》），已針對大陸變局後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問題，提出了中國自由主義式的反省與批判。

然而，「政治民主化」從論述層面到制度面的實踐，則是最近六年的發展，自一九八六年以來，民主進步黨成立（1986）、解除戒嚴（1987）、終止動員戡亂時期（1991）、第一屆中央民代退職（1991）、憲法頒佈後第一次修憲國民大會的召開（1992）、立法院首次全面改選（1992）等，都是台灣戰後歷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這些歷史事件逐步地構成我國政治結構的變遷。然而，我們應如何辨識與追究這些變遷？本研究試圖從論述之「史」的層面探究台灣民主化的歷程。

二、問題的提出

面對以上同樣熱中討論「政治民主化」議題的五〇及八〇年代，我們對台灣戰後政治論述產生一項好奇：為什麼「政治民主化」會成為這二個年代共同的議題？這二個年代對這項議題的理解、實踐與評估有何關係？是八〇年代依照五〇年代的理解及論述方式延續當時的討論？或根本就是兩組「不可共量的」（incommensurable）論述，彼此只是形似？或其他關係？

這項好奇引發本研究對台灣戰後政治論述之「史」的興趣，乃試圖進一步在歷史、理論、方法論及人物等四個層次，說明研究《自由中國》之「論述」層面的正當意圖。本研究打算在這四個層次探究《自由中國》的憲政論述的多重意涵。以下問題是層次交疊地關聯在一起，必須同時照顧四個層次才得適當地理解與解決問題：

1. 歷史層次：什麼是《自由中國》半月刊？它在五〇年代的台灣社會扮演的角色？《自由中國》的憲政論述在台灣戰後政治論述史的地位？
2. 方法論層次：在政治研究中，為什麼／如何研究政治論述？
3. 理論層次：何謂政治論述？憲政論述？政治論述如何存續、變遷或消失？與政治行動的關係？
4. 人物層次：《自由中國》在不同階段的主要撰稿人如何及為什麼使用「那些」論述規則在「什麼情境」中進行「那些論述」？

我們先提出兩項命題作為分析起點：

1. 五〇年代《自由中國》的憲政論述是台灣戰後政治論述的起點。
2. 它深刻地影響了七〇年代以後台灣反對運動的政治議題及論述方式與政治行動的策略。

如何區辨歷史的政治論述及論述的「起點」？這項辨識是一項方法論上的要求，同時涉及歷史層次的考慮：

1. 如何辨識「同時代的」政治論述：即從「橫向」觀察政治論述。在五〇年代的台灣，除《自由中國》之外，其他如國民黨的政工系統、海外「第三勢力」也都同樣熱切地討論政治民主化的議題。如何認定那些是「同時代的」、「重要的」、「政治論述」？
2. 如何辨識「跨時代的」政治論述：即從「縱向」觀察政治論述。當我們對台灣戰後五〇及八〇年代對「政治民主化」的理解、實踐與評估的關係感到興趣時，那麼我們必須處理的是不同時代的論述產生對話的可能、形式、過程及結果。如何進行跨時代的研究？如何判定八〇年代的議題與五〇年代的論述，存在重要且亟需界定的關係？

上述的說明至少已浮現出初步的思考路徑：基於對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關心，產生對台灣戰後政治論述的興趣，乃試圖在歷史、

理論及方法論等層次上，尋求建立分析架構的可能性，從橫面與縱面分析《自由中國》之憲政論述的多重意涵。如果能成功地說明五〇年代《自由中國》的憲政論述無論在橫面或縱面都是重要的政治論述，那麼本研究就不應被視為一種懷舊的或多餘的而非歷史的興趣，因為本研究所要進行是解釋「為什麼在那些歷史情境中，那些議題，會引起那些人，以那種規則提出那些論述，而獲得那些反應」，而不是根據某項理所當然的「理論標準」指出誰在文章中說「對」或說「錯」。

事實上，本研究所處理的歷史、理論、方法論及人物等四個層次的問題，是建立以「台灣戰後政治論述史」為總綱領的研究架構，《自由中國》的憲政論述是分析的第一階段，也是這項企圖的一次演練。

三、研究目的與重要性

(一)歷史層次：《自由中國》的憲政論述作為台灣戰後政治論述的起點

我們在歷史層次上要回答的問題：為什麼《自由中國》的憲政論述是台灣戰後政治論述的起點？

這項問題牽涉到台灣戰後政治史的分期及《自由中國》所處的論述背景。所謂「戰後」除了指稱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年代之外，還有其他值得注意的意涵？「起點」不等於時間上的「最早」，這項起點的辨識同時牽涉歷史、理論及方法論等層次，在此先就歷史層次進行分辨。

目前關於台灣戰後歷史的分期尚難有定論，但若從威權與民主的消長關係來看，《自由中國》半月刊正是始於第一階段民主與威權的爭議中（一九四九～一九六〇年），在第二階段初期政治權威定於一尊的情況之下終止發行（一九六〇年九月）。至少從發行時間（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創刊，至一九六〇年九月一日停刊）來看，《自由中國》的始末與民主／威權爭議的起落息息相關，《自由中國》的憲政論述極有可能參與這項爭議過程。

從五〇年代的論述背景來看，一九四九年是國民黨重建統治地位的起點，也是「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正式對抗的開始。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對國民黨而言，維繫統治地位與對抗共產勢力是一組互為目的與手段的價值，對內以反共重建政權，對外以反共配合美國全球戰略的需要。無論就統治地位及國際形象的重建或國際情勢的轉變，國民黨都必須高舉自由民主的大旗，作為它在台灣號召海內外中國人認同及作為自由世界之一員的符號與標誌。

另一方面，朝野人士乃開始思考何以短短的四年內共產黨即能擊垮國民黨取得大陸政權？他們獲得國民黨必須推動民主憲政才能對抗共產黨的看似一致的結論。這項對國民黨大陸政權的反省與批判主導了台灣五〇年代朝野的政治論述，「民主」、「自由」及「憲法」成為朝野論述共享的對象與工具。其實，無論在朝野之間、國民黨內部或在野勢力本身，缺乏共同或相容的論述內涵與規則，即基於各自的「論述典範」卻仍能出現一致的結論，這表示對五〇年代的台灣社會而言，「如何建立與維繫民主憲政」是不分黨派公認的核心議題，有關憲政議題的論述即是當時最具代表性的政治論述，《自由中國》的憲政論述更是這類議題的典型論述。因此，國府播遷來台重建統治地位及美國全球戰略的需要，構成五〇年代朝野人士進行政治論述的背景，對中國變局進行自由主義式的反省則是台灣戰後政治論述的起點。

《自由中國》半月刊就是基於上述背景所發行的政論刊物，它絕不只是一份反共或反國民黨的刊物。在發行初期它接受國民黨的資助，後期也試圖發起組黨活動，但自始至終它不曾屬於任何黨派。但這絕不表示《自由中國》缺乏明顯的意識型態立場，其中的憲政論述就是代表五〇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典型論述。從《自由中國》的憲政論述的內涵與規則，可呈現出五〇年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特定的「政治秩序」概念或稱論述典範。

在創刊號中，由胡適寫下《自由中國》的創辦宗旨，即充分展現五〇年代政治論述的背景，也就是五〇年代中國自由主義者所最關心的問題：

第一、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向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各級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向民主的社會。

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不讓他擴張他的勢力範圍。

第三、我們要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域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

第四、我們的最後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

在前後十年九個月又十天的發行時間中（二百六十期），這四條宗旨一直刊登在每期的《自由中國》，但在發行期間這份宗旨也曾有過不同形式與比重的論述。傅正先生認為《自由中國》的發展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分界點是在四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的《祝壽專號》（第十五卷第九期），「在這以前的將近七年時間，《自由中國》比較偏重理論方面，與現實政治的接觸面比較少，但不是說完全沒有；從『祝壽專號』起就逐漸偏向現實政治層面；四十六年四月第三屆臨時省議員及縣市長的地方選舉，《自由中國》花了很多篇幅評論和報導，《自由中國》後來跟地方選舉有進一步的關係，乃至於發展為『中國民主黨』的組黨救國運動，主要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雷震全集，第二冊，頁三四一）《自由中國社》於民國四十七年出版名為《今日的問題》的小冊子，正代表論述重點的轉移^{（註一）}。

民國四十八年《自由中國社》所發起的《反對修憲連任運動》及四十九年的《組織反對黨運動》，更是《自由中國》後期論述的代表作^{（註二）}。縱使論述的重點與企圖曾有過轉移，《自由中國》始

註一：這冊子集結發表於四十六年及四十七年的若干社論文章。在《代緒論》中，編者說「我們預備本著積極而寬徵的態度，面對當前的現實，從本期起，在『今日的問題』這個總題目下，提出一系列的問題。這一系列的問題所觸及的範圍，包括政治、軍事、經濟、財政、司法、思想、文化、教育、宣傳等等。」其中關於反對黨的討論—《反對黨問題》—最具代表性，這篇文章不僅宣示了《自由中國》對當時政治出路看法，更預示日後籌組「中國民主黨」的行動。

註二：前者強烈質疑國民大會醞釀修改臨時條款，使總統得連選連任不受憲法連任一次之限制的正當性；後者則意識到政黨競爭才是政治民主化

終未偏離其創辦宗旨所鋪設的論述主題，也是台灣戰後政治論述的第一個論題——以自由民主對抗共產極權，重建自由的中國。

所以，《自由中國》於發行期間所提出的議題，其廣度包含一個國家政治民主化直接或間接遭遇的問題，其深度也代表五〇年代的中國自由主義者對中國變局的認知與反省。無論從論述內涵或其提出之背景及反應，《自由中國》的憲政論述都是台灣戰後政治史中極為緊要的論述，它不僅呈現出台灣在五〇年代所面臨的具體的生存問題，更可看出當時的論述者運用那些辭彙根據那些規則如何去認識、解釋及批判什麼問題，也就是表現出當時的論述者各異的「世界圖像」。

前述歷史層次上的問題，能否在方法論自主的條件下，進行正當的歷史論述分析？

(二)方法論層次：對「論述」(Discourse)的分析

本研究在方法論層次上要回答的問題：何謂「論述」？何謂「典範」？為什麼／如何正當地研究「論述」？

當人們憑藉各種途徑投入不同公共議題的討論，甚至進一步成為行動者時，其中以「語言」與「文字」所進行的表述即稱為「論述」。個別論述的內涵與提出並不是人類群體生活中的孤立或突發事件，而是先前提出之其他論述所構成的「論域」(Field of Discourse)中，可預期與解釋的活動。這項論域同時反映出這個社群當時流行的政治理念、政治議題、表述方式、公共價值位階的排列及行動方案。

「論述」的構成與提出都出自於一套特定的價值體系，簡單地說，它是一種世界觀(Gestalt)，它推衍出對歷史、社會及人性的特定觀點。用孔恩(Thomas Kuhn)的術語來說是這套價值體系就是人類社群成員所使用的「諸」論述「典範」(Paradigms)。

「典範」概念的核心意義在於能對信徒形成強大且獨占的支配力，使他們虔誠地按照典範的指示經營私人及公共生活。「典範」

的關鍵，也是突破當時政治格局的唯一途徑，乃起而結合省籍地方菁英開始討論組織反對黨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的獨占地位只對信徒才有作用，只要不信仰它，它就是一文不值。所以，政治社群中「流行的」典範不是也不可能是唯一的，而是指只要明顯流通於意見市場（無關合法或非法）並有能力擁有「消費者」或「信徒」（無論人數多寡）的價值體系即稱為典範。這是本研究對「典範」概念暫時廣義的使用。

既然政治社群中的典範是多元並存的而非單一的或統一的，諸典範之間即常存在著競爭與衝突。當某個典範的信徒接觸到或知道其他典範的存在時，可能會出現兩種反應：將它視為異端邪說或變節改宗。因此，為了加強競爭力，諸典範競相透過可用之管道爭取信徒，傳布信仰，提昇獨占力的影響範圍，這是「典範」的先天特性。

「論述」的提出就是為了建立或捍衛典範。論述本身的豐富意涵，唯有從論述所擁護的典範，及與當時競爭的其他典範共同形成的論域中，才得理解。然而，當市場中某項論述無法被歸類或理解，加上典範與成員、典範與典範之間本就缺乏可區辨的標誌或符號時，除非論述者能遵守源於典範的且為公眾所預知的論述規則，否則論述本身可能在逸出原有意圖的情況下，發生非預期的效果，反而破壞了典範的獨占地位。

其次，明示的論述規則可提供「消費者」選擇的依據。一組易懂流行的規則會較容易吸納信徒，增強競爭力。一個典範的競爭力與信徒人數無關，而是信徒的行動取向和行動力有關。所以，為能有效地建立與捍衛一個典範，明示的論述規則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無論是站在學術研究或政治活動的需要，「論述規則」（Discursive Rules）是除了典範及論述之外，第三項需要注意的概念。

論述者、論述內涵、論述規則及典範等四者就構成本研究在方法論上的四個支點。根據這項提示，我們在面對某種論述時，就要問：「誰」在「何時」根據「那些規則」向「誰」「說了什麼」？為什麼？畢竟我們感興趣的是歷史中的論述，是活生生的人在具體的時空背景中進行的活動，而不是將論述從歷史中抽離出來，然後再針對一言一詞進行語意分析。

(三)理論層次：政治論述之多重特性的分析

本研究在理論層次上要回答：何謂「政治論述」？何謂「憲政論述」？政治論述如何存續、變遷或消失？如何發揮跨時代的影響力？

在此，我們提出「政治論述」的暫時定義：按照典範所提供之明示或默示的論述規則及關於「政治」的界定所進行的論述總稱。其次，我們提出「憲政論述」的暫時定義：針對與立憲主義相關的「觀念」議題、與政府統治相關的「制度／政策」議題、與政治活動相關的「行動議題」等三大議題所進行的論述總稱。

根據這項界定，我們問：何以五〇年代的政治議題與論述典範仍能在七〇年代發生作用，而且是更明顯的作用？這是針對政治論述的「縱面」的討論。

「論述典範」的存在必定伴隨著針對一組特定的政治議題認定、解釋與批判。按照孔恩的說法，一個學術典範的競爭力能否持續就看它能否持續地成功地解決學術社群中的疑難，並維持社群成員的信仰與歸屬感。根據這項說法所提供的解釋，《自由中國》所以能具有深遠的影響力，是由於它所代表的五〇年代自由主義論述典範，一直能解決社群中的政治爭議，成功地維繫人民的政治信徒與社群歸屬感。既使到了七〇年代，仍能以流行「語言」與「規則」繼續開發議題，吸收信徒，維持典範地位。

但這項對《自由中國》深遠的影響力的解釋，應進行相當程度的說明與限定。以下是有關政治論述典範之消極特性的說明：

1. 論述典範的多元並存是政治社群中的常態，典範之間有時衝突、兼併或相容，政治權威的「定於一尊」則極少真正地發生於論述層次。所以，無論在發行期間或七〇代以後，《自由中國》所代表的五〇年代自由主義論述典範從不曾居於獨尊的地位，而仍是與其他並存的典範競爭。
2. 當一項論述典範失去主要的論述者時，那麼它同時失去引發行動的能力。一九六〇年九月「中國民主黨」的核心人物被捕入獄後，《自由中國》從此宣告停刊，它所代表的中國自由主義論述典範也喪失論述管道，組織反對黨運動也暫時銷聲匿跡。如

果民主進步黨的成立是台灣民主化歷程的重要事件，這表示與反對黨之成立相稱的論述典範也具同等的重要性，如何適切地將這項典範安置在對反對黨之建立的理解與解釋中，則顯得十分必要。

- 3.當一個典範被使用或重新擁有使用者時，絕不是因為它已經或曾經成功地解決過政治爭議。自一九六〇年九月《自由中國》停刊以來，自由主義論述典範不曾以明示的標誌及規則持續地進行論述。七〇年代以後，這項典範不斷地引發政治議題，特別是有關憲政結構的議題。何以失去舞台的自由主義論述典範能重新取得影響力？無論答案是什麼，絕不是因為這項典範曾成功地解決過政治爭議，因為它根本沒有機會去嘗試。

基於本上述三項政治論述典範的「消極」特性，我們正式地問：既然《自由中國》所代表的自由主義論述典範，不曾成功地解決過台灣戰後歷史上的政治爭議，且六〇年代初起已喪失正式的論述管道，何以在七〇年代以後重新展現影響力？論述典範的存續是否不完全或根本不在於其解決政治爭議的能力？我們推論《自由中國》跨年代的影響力是政治論述典範之「積極」特性的展現。

- 1.一個論述典範不因論述者在政治活動層次上的挫敗而崩潰。當《自由中國》藉著論述語言與規則的保存與傳播，使後代讀者得認識前人的論述典範提供的議題及其界定、解釋與批判，而相信五〇年代的論述典範具有參考價值。因此，五〇年代《自由中國》代表的自由主義論述典範，對七〇年代的讀者是可以理解的、未過時的且覺得是重要的。然而，何謂「保存」？誰來保存？如何保存？保存某項論述典範是有意的選擇或是歷史的偶然？
- 2.如何理解不同年代的論述典範？典範本身具有的儲存記憶即重構歷史情境的能力，這是一個論述典範能否存續的關鍵：七〇年代的讀者從五〇年代論述典範中，閱讀當時論述者的記憶，從中藉著五〇年代的論述語言與規則，認識它所界定的議題及學習歷史中的論述者的行動策略。這項功能如何成為政治論述典範之存續的關鍵？

政治論述典範的積極特性，說服後代讀者相信《自由中國》是值得參考的，造就了五〇年代的論述典範在七〇年代的重現。《自由中國》正提供七〇年代以後的台灣社會，一組相近的議題、論述內容、論述方式及論述規則，並在政治活動上提示了可行的策略。

這也是七〇年代以後的讀者能夠在不同的情境中，仍自認能理解與運用《自由中國》之論述典範的關鍵所在，否則台灣戰後歷史將是不可理解的。本研究若能充分解釋論述典範之積極特性的存在，那麼，在理論上，本研究將可運用這項解釋，進一步建立更完整的分析架構，以安置台灣戰後的政治論述。

(四)人物層次：論述者之政治秩序概念的分析

在方法論層次中，我們出論述者、論述內涵、論規則及典範等四者是本研究在分析上的四個支點。當我們問：「『誰』在『何時』根據『那些規則』向『誰』『說了什麼』」時，其中的兩個「誰」就是論述者。由他們運用規則提出論述，產生交談關係。因此在「論述」層面的討論中，論述者的角色必須特性注意處理。

在這個層次上，我們將選擇《自由中國》在不同階段的主要撰稿人，從他們的文章主題內容、發表時間、反應等，推演出其論述典範或政治秩序概念。在此我們提出一項暫時的假定：《自由中國》的主要論述者所憑藉的是結合西方自由主義與中國知識份子之道統觀念的論述典範，這是兩套論述規則的結合，我們暫時稱為這項典範為「中國式的自由主義」。西方自由主義可能與中國的道統觀念結合？如何結合？如何吸引那些人什麼時候如何運用？

四、本研究的可能貢獻

這份影響深遠的雜誌至今尚未得到學術上應有的注意。至目前為止，國內以《自由中國》半月刊為主題的研究十分有限，一直未能將其政治論述安置於適當的歷史、方法論及理論等層面，

進行有系統的分析，更不用說以《台灣戰後政治論述史》為總綱領，討論台灣戰後政治論述^(註三)。本研究期望能在以下幾方面有所

註三：魏誠（1984）、錢永祥（1988）、林毓生（1989a, b）及張忠棟（1990）等四位先生曾以《自由中國》為題撰寫論文。誠如錢先生所說，魏誠的碩士論文雖是目前唯一的專題研究，但「該文主旨係整理《自由中國》政論議題的分布態勢，並配合當時台灣政局，對該刊的政治主張加以評估，並未涉及這些主張背後的理論及思想問題」（58），錢先生也認為自己的這篇論文「單從思想上做邏輯性的推敲，不太可能掌握住真實的歷史圖像。」¹許多涉及該刊在五〇年代台灣社會所扮演的角色的問題，必須留待史學家去做較細緻的研究」（97）。錢先生基本上將《自由中國》視為台灣戰後以宣揚自由主義理念的政論刊物，是代表中國自由主義者對中國局及前途的典型反省與見解。林毓生的論文則是對胡適在《自由中國》所發表的《容忍與自由》一文所發的討論進行屬於思想史的分析，相當程度是針對胡先生思想特質一源自中國傳統的一元論思想模式（*monisti-intellectualistic mode of thinking*）的分析，其中亦論及參與討論的毛子水及殷海光等人的回應。基本上，林文不是對《自由中國》全面性的研究，但就分析主題而言，卻又是《自由中國》的主要論述方向（請參見『發行宗旨』）緊密相關。林先生基本上將《自由中國》視為延續中國知識份子固有之思考方式的刊物。最後，張忠棟的《為自由中國爭言論自由》也是針對胡適在《自由中國》時期所發表的幾篇文章，闡釋胡適對「言論自由」原則的堅持，是對胡適的政治理念的敘述《自由中國》只能算是該文的背景而非主題。除了缺乏研究上的探討之外，連《自由中國》相關資料的編纂也是乏善可陳，更不用說有系統地整理五〇年代所有的政治論述材料。「八十年代」出版社於一九七九年，以「地方自治與選舉」、「司法獨立」、「言論自由」及「反對黨問題」等四項主題，選編《自由中國》半月刊的文章，以《『自由中國』選集》為名出版（共四冊）。這部選集試圖忠實地呈現《自由中國》的言論方向，但基於當時種種的政治考慮，很多文章只能用摘要的方式，其中《反對黨問題》甚至遭警總查禁。所以這部選集的作用也就僅止於片斷地呈現當時的政治論述，但對當時的言論空間而言，這部選集的出版有著相當的象徵意義。一九

貢獻：

1. 嘗試從「論述」層面解釋台灣民主化歷程。台灣民主化是一項歷史問題，人類不可能在事先即可明白或規畫歷史的發展，唯有從政治行動者在具體歷史情境進行的思考與行動，才可能解釋這項歷史歷程。本研究藉著本土戰後政治史的討論，企圖說服的是：由於人類論述的多重特質，使得「論述」對任何針對人類生活形式之變遷的研究而言，都應當是最優先被解釋的變項^(註四)。
2. 探究早期台灣反對精英之政治論述及政治秩序概念的特質，確認台灣戰後政治論述的起源。只有瞭解行動者的思考，才可能解釋行動的發生、時代意義及影響。但本研究並未預設行動者的思考是政治行動的獨立變項，思考、論述與行動的多重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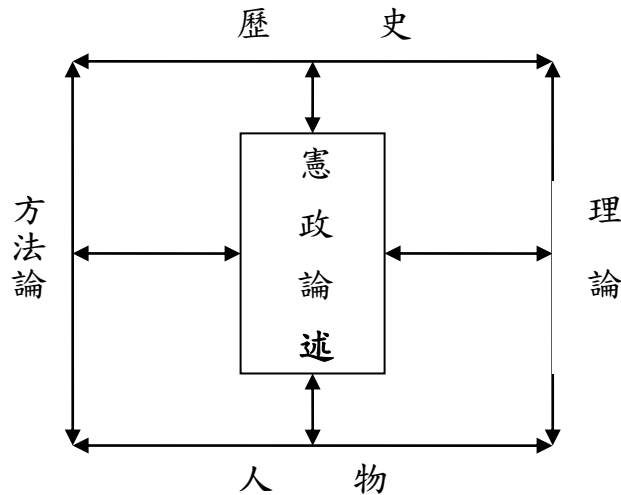
九〇年由澄社主辦的《紀念雷震案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台灣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共發表了十四篇直接或間接相關於《自由中國》的論文。從該研討會論文可看出，九〇年代的學術工作者將《自由中國》視為五〇年代政治反對運動的圖騰，以憑弔的心情看待這份政論雜誌或主要人物時，除了緬懷其抗議精神，其他則少有探討，更不說有系統地處理其政治論述的橫面與縱面意義。有關《自由中國》最詳盡的材料就是由傅正先生主編的《雷震全集》(共四七冊)。這是一部私人全集，其編輯內容主要是雷先生發表於《自由中國》半月刊的政論文章、雷震案始末與回憶、一部分回憶錄及一九四八～一九七七年的日記等。由於作者與編者都是直接參與《自由中國》的創刊、發行、編輯及停刊，更是當時政治論述(特別是籌組中國民主黨期間 1958～1960)的主角。編者試圖透過編輯針對五〇年代所流行政治議題，進行議題「還原」及「再論述」。雷先生在生前亦曾對全集內容進行註釋與說明，這也是這部全集的重要特色。

註四：本研究明白質疑以下看法：(一)民主化是一項命定的、不可違逆的世界潮流，台灣民主化是全球民主化的趨勢所帶動；(二)本土菁英的政治意識與政治行動是在這股浪潮下，別無選擇地圍繞著民主化的正反面打轉，研究者對於這些蘊涵在政治行動與論述之深層的論述典範可正當地存而不論，或以總體現象的解釋化解個別論述的時代意義及解釋的必要性；(三)將政治論述視為結構變遷的單向「反應」，否定政治論述固有的塑造及認識結構變的主動能力。

也是本研究探討的問題之一。

3. 檢視「政治思想史」作為一門學科的正當性，及政治思想史方法論的自主性及其提供研究方法之可能性，並藉此改變國內學界對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刻板印象。政治思想史研究是一種歷史而非哲學研究，不等於也從來就不是讀讀古書即了事。以本研究為例，它必項根據政治論述的複雜性質，建立適當的分析架構，藉著回答「『誰』在『何時』根據『那些規則』向『誰』『說了什麼』？為什麼？」，重視《自由中國》所提出的憲政論述。唯有適當地提出及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才能得知台灣戰後歷史的第一個十年到底發了什麼？一旦我們對歷史無知，如何進行解釋？

本研究分析架構請參見下圖：



外圍的四道雙箭頭指涉本研究所觀察的四個層面的層次交疊關係；處於中心的「憲政論述」與四個層面的雙箭頭則指涉兩者的互為建構的關係^(註五)

註五：關於這項互為建構的關係的形成，請參照本期《東吳政治學報》「政治思想史『作為』什麼——一項生態觀點的序言」

參考文獻

- 林毓生 1989a 「兩種關於如何構成政治秩序的觀念」，《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頁三一四八，台北：聯經。
- 林毓生 1989b 「對於胡適、毛子水、與殷海水論『容忍與自由』的省察」，《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頁四九一七三。
- 張忠棟 1990 《胡適五論》，台北：允晨。
- 傅正 1989 「種籽發芽了！一雷震案的歷史意義」，《傅正文選》(三)，頁三六一—三七〇。
- 傅正 1990 「《自由中國》的時代意義」，紀念雷震案三十週年學術研究會論文。
- 雷震 1989 《雷震全集》，傅正主編，台北：桂冠。
- 錢永祥 1989 「自由主義與政治秩序一對《自由中國》經驗的反省」，《台灣社會季刊》，第一卷第四期，頁五七一—九九。
- 魏誠 1984 《自由中國與半月刊內容演變與政治主張》，政大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1990 《台灣歷史年表》 終戰篇 I (1945-1965)。
- Ball, Terence 1988. Transforming Political Discourse. Basil Blackwell.
- Fairclough, Norma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Polity Press.
- Kuhn, Thomas S. 1991. 《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王道還等譯，台北遠流。
- Pocock, J. G. A. 1962.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 Methodological Enquiry.'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Second Series), ed. Peter Laslett and W. G. Runciman, 183-203.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_____. 1973. 'Verbalizing a Political Act: Toward a Politics of Speech.' Political Theory 1: 27-45.
- _____. 1985.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 Press.
- _____. 1987. 'The Concept of a Language and the Metier d' historien: Some Considerations on Practice.' In The 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Modern Europe, ed. Anthony Pagden, 19-38.

- Cambridge Univ. Press.
- ____ 1989. Politics, Language, and Time. Univ. of Chicago Press.
- Skinner, Quentin. 1978.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2 Vols, Vol. 1: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Univ. Press.
- ____ 1988a.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Meaning and Context, ed. James Tully, 29-6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 ____ 1988b. 'Motives, Intention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xts.' In Meaning and Context, 67-78.
- ____ 1988c. 'Language and Social Change.' In Meaning and Context, 119-132.
- White, James B. 1984. When Words Lose Their Meaning: Constitution and Reconstitution of Language, Character, and Community. Univ. of Chicago Press.
- Wood, Neal. 1978. 'The Social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Political Theory 6: 345-67.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onstitutional Discourses in the Free-China Semi-Monthly

Chen, Jui-Chung

According to the methodical implications of 'new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we intend to conduct a historical analysis toward the constitutional discourses of the *Free-China Semi-monthly* that published from 1949 on the historical, methodological, theoretical and individual levels.

Two propositions on the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levels were the Starting point:

1. the *historical* : the constitutional discourses in the *Free-China Semi-monthly* w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political discourses of the post-War Taiwan.
2. the *theoretical* : the innate action orientations of political discourses created a co-existent and co-varia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scourses and actions.

I postulate that constitutional discourses contained the following issues : the issues of 'idea' relevant to constitutionalism , the issues of 'institutions/policies' relevant to the government (the constitutionality or unconstitutionality of governmental policies), and the issues of 'action' relevant to political activities. Constitutional discourses contain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s and meanings that constructed by historical, political, ideal and linguistic elements.

This research is a deep survey towar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linguistic, and ideological levels of constitutional discourses. On the other hand, we to discuss the understandings, opinions and uses of political elites on try the ideas of "political order", "constitution" and

"democracy".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constitute the core concerns of our research:

1. The *historical* : What was the unique importance of the constitutional discourses of the *Free-China Semi-monthly* in 1950s Taiwan?
2. The theoretical: What are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discourses? How did continue, change and disappear?
3. The *methodological* : Why should we analyze political discourses in the study of structural changes? What were the significances of 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s for political analysis?
4. The *individual* : What were the political beliefs of the authors and editors of the *Free-China Semi-monthly* ? What they said and wrote were authentic and practical for themselves and the readers? What were their discursive rules? How were they formed and obeyed?